

改革开放30年

回顾与展望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改革开放 30 年: 回顾与展望 /《浙江社会科学》编辑部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308-06479-8

I . 改… II . 浙… III . 改革开放—研究—中国 IV .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3141 号

改革开放 30 年: 回顾与展望

《浙江社会科学》编辑部 编

责任编辑 张 琦

文字编辑 吴伟伟

封面设计 俞亚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 zupress@mail.hz.zj.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http://www.press.zju.edu.cn>)

电话: 0571—88925591 88273066(传真)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7.75

字 数 500 千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6479-8

定 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前　言

2008 年,我国改革开放大业迎来了 30 周年。30 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并不算长,但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改革开放 30 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回首 1978 年以来的发展历程,从思想观念到生活方式,从经济生活到社会结构,从农村到城市,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如果放在中国上百年、上千年历史变迁中、放在当今世界的大变局中加以审视的话,那么,我们就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改革开放 30 年对于现代中国的崛起、中华民族复兴的重大意义。

伟大的理论来源于伟大的实践,伟大的实践呼唤伟大的理论,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以改革开放 30 年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以及法学、哲学、文学、历史学等不同视角回顾总结改革开放 30 年的演进轨迹与成功经验、研究探讨当前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问题与对策、分析把握未来中国发展的趋势与规律,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向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的课题,也是社会科学理论更好地发挥指导社会实践功能的内在要求。为此,《浙江社会科学》编辑部从 2007 年 9 月开始,着手开展改革开放 30 年研究的征文活动。

征文启事在《新华文摘》2007 年第 20 期、《浙江社会科学》2007 年第 5 期和第 6 期及浙江社科网(<http://www.zjskw.gov.cn>)登出后,得到了省内外广大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及实际工作者的积极响应。截至 2008 年 9 月底,编辑部共收到应征论文 240 余篇。这些论文从宏观、中观、微观等不同视角,或规范或实证,运用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就意识形态的变革与经济、社会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文化支撑体系,渐进式改革的特点、国际比较与评价,改革开放与民营经济发展,经济转型中的政府行为,浙江现象、浙江经验及浙江发展道路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具有启发意义的见解。

编入本书的 36 篇是经专家严格评选出的优秀论文。从学科归属来看,

这些论文大致可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方面。从第1篇雷云的《论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及其与新时期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到第13篇叶笑云、阎巧玲的《非均衡发展中的“倒逼”效应与开源式治理》，主要从邓小平理论、意识形态及地方政府行为等政治学视角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经验。从第14篇段先盛的《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探究》到第23篇杨海涛、战明华、许苗苗的《浙江新农村建设的现实路径选择：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多侧重于经济学角度的分析，不少文章以浙江的经济发展道路或现象为例展开论述。从第24篇毛丹的《村庄的大转型》到第30篇胡晓慧的《略论转型期的法官造法及其控制》，主要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轨迹及经验。从第31篇陈立旭的《以全新理念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到第34篇王姝的《改革开放30年历史文学与现代民族认同建构》，主要从文化角度开展研究。白小虎的《“市场大省”30年》与石婷婷的《关于改革开放30年评价问题的若干观点述评》分别就专业市场的理论与实践、改革开放30年的评价问题作了梳理与评论，一并收入本书。

最后，借本文集正式出版之际，我谨代表《浙江社会科学》杂志社，向踊跃参加我们“改革开放30年征文”活动的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对未能入选本文集的应征作者表示深深的歉意！

《浙江社会科学》杂志社社长、主编

俞伯灵

目 录

论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及其与新时期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为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30周年而作	雷云(1)
邓小平发展观视野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诠释	曹富雄(1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历史启示	
——从利益角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基本规律	李英田(23)
反腐倡廉：从政治自觉到文化自觉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廉政观念的演进	励慧芳(35)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改革开放	
——兼论党成功领导改革开放的要素	俞云根 孔德生(45)
区域制度变迁与地方政府功能透视	
——基于“苏南模式”的分析	汪波(52)
政府与市场：互动中的地方政府角色变迁	
——在于浙江现象的个案分析	何显明(63)
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模型分析	陶永亮(77)
行政决策分散化：行政分权下的中国政府决策	
——基于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政府决策权的考察	董娟(89)
制度创新与地方政府的作用	
——基于温岭经验和特征的解读	朱圣明(96)
信用制度创新：浙江的经验与启示	何建华(107)
大国崛起的地方政府激励与效率之路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厘清、反思与展望	尚虎平(117)
非均衡发展中的“倒逼”效应与开源式治理	

- 转型社会的信访制度实证研究 叶笑云 阎巧玲(151)
- 1978 年以来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探究
- 有限理性政府试错式改革与满意实现 段先盛(164)
- 浙江工业结构变动优化的实证分析(1978—2007) 杜 平(177)
- 浙江模式劳动关系
- 自行协调、走向两利 徐小洪(192)
- 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与启示
- 兼论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 徐旭初 黄祖辉 邵 科(203)
- 30 年农村改革回顾与改革的深化
- 基于浙江省的分析 章猛进 顾益康 黄祖辉(216)
- 浙江省区域经济差异的测度分析 蔡挺伟(226)
- “浙江式”区域协调发展道路：山海协作 朱汉清(237)
- 农业产业化组织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
- 基于利益联结机制的视角 俞雅乖(248)
- 我国工农业互动现状、协同问题及政策研究 钟 钰 蓝海涛(259)
- 浙江省新农村建设的现实路径选择：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 杨海涛 战明华 许苗苗(271)
- 村庄的大转型 毛 丹(281)
- 现代化发展模式创新
- 浙江改革开放 30 年社会发展逻辑与启示 杨建华(299)
- 草根智慧与社会空间的再造
- 浙江经验的一种空间社会学解读 张兆曙(311)
- 住房改革进程中的公民社会发育
- 以杭州 F 社区为例 张敏杰(319)
- 农民失地过程风险与结果风险的组织化矛盾 徐晓军 张必春(329)
- 改革开放 30 年农村社会转型及其启示
- 以金华市为例 胡新民(343)
- 略论转型期的法官造法及其控制 胡晓慧(355)
- 以全新理念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基于浙江实践经验的研究 陈立旭(369)

经济体制改革与当代文化建设一体化的思考	王 新	(382)
从“以海为田”到“以海为途”		
——改革开放以来舟山海洋文化发展轨迹探究	王文洪	(392)
改革开放 30 年历史文学与现代民族认同建构	王 姝	(401)
“市场大省”30 年		
——专业市场的理论、实践与研究展望	白小虎	(411)
关于改革开放 30 年评价问题的若干观点述评	石婷婷	(423)
后记		(434)

改革
开放
30
年：
回
顾
与
展
望

30
年

论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及其与 新时期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为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 30 周年而作

雷 云 *

【摘要】 邓小平认为 20 多年“左”倾错误的最重要经验教训，是对“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他抓准发展生产力这个核心问题提出了一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纠正了我们过去往往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主要是甚至等于阶级斗争理论的片面认识。这一马克思主义观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完全吻合，一脉相承。正是在它的指导下，逐步地正确回答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关键词】 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观；发展生产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0 多年“左”倾错误的教训引发了对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重新思考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我国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就及时总结国内国际经验，指出我们要以苏为鉴“进行第二次结合”，制定“自己的建设路线”，以求“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他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具体道路的奠基之作。这两部著作提出了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等重大理论观点以及一系列相关的重要战略思想和方针政策，为这一探索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和路线的指导，并在实践中迅速取得成效。不幸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左”的干扰，时隔年余这一探索即偏离科

* 雷云，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名誉主席，研究员。

学的轨道。当然也要看到，50 年代后期开始，步入晚年的毛泽东尽管陷入“左”的迷雾，还是在发展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划分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等问题上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和闪光思想。但它们往往自相矛盾，未能首尾一贯，形不成科学体系，其理论的主流方面是失误，主要表现在：第一，在无产阶级国家历史使命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认识有很大的片面性，致使对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根本任务作出错误判断，把阶级斗争当作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第二，对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和解决途径的分析有所缺失，离开生产力落后的实际状况致力于建立公有化程度更高的所有制关系；第三，夸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热衷于通过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不断革命”去推动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用这些“左”的理论观点来指导党的政策策略，就是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路线。用它们来指导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就是经济上超越阶段，急于求成、急于求纯，搞“大跃进”、“穷过渡”；政治上连绵不断地搞大规模群众运动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把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绝对化；意识形态领域搞无休止的上纲上线的“革命大批判”，实行所谓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的“全面专政”。而所有这一切理论和实践，都被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真正坚持，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大的历史转折。全会深刻总结 20 多年“左”的理论和实践造成严重危害的沉痛教训，提出了全面拨乱反正，重新正确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性课题。1981 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科学总结经验教训和精辟阐述如何解决这一历史性课题的纲领性文献。邓小平在全会前后，尤其是 80 年代，对《决议》的基本精神作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发挥。他鉴于 20 多年“左”倾错误的理论根源，在于抛开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发生了偏差，因此突出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恢复正确的思想路线，并以此为指导，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这是使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重新纳入科学轨道的前提，是开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关健。

邓小平早在 1980 年 4 月的一次谈话中就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①1984 年 6 月的一次谈话，尖锐地提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认为“我们过去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12 页。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①。在1985年4月的一次谈话中又说，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②。这就明白无误地点出了过去犯“左”倾错误的症结所在，指明了总结经验教训，拨正航向、破浪前进的总体思路。

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这是不同层次又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从广义上说，(科学)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从狭义上说，(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则是整体、基础和本原。所以只有首先在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问题上解放思想，才能在什么叫社会主义问题上解放思想；只有首先搞清楚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才能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才会有科学的社会主义观。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率先解放思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运用唯物史观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认识，从一种新的视角提出了一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在此基础上合乎逻辑地逐步回答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抓准生产力这个核心问题 构建了一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

邓小平回答“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先后提出含义一致，只是表述稍有不同的三个重要论断。一是1981年12月：“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是要发展生产力”^③；二是1984年6月：“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④；三是1985年4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⑤。“归根到底”、“最注重”、“基本原则”三个定语，都把马克思主义最终落脚到发展生产力上。他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特征下定义，也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作界定，而是讲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是讲从总体上、从终极意义上如何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要义和真谛。这三个论断，集中体现了邓小平对马克思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③ 《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91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主义的认识和理解，生动深刻地表达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观。

提出这三个论断，是直接针对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我们以前曾长期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主要是甚至等于阶级斗争的理论，而把发展生产力放在次要的位置。这种片面理解，显然与受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的影响分不开。大家知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解放的步骤和条件主要有三个：一是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二是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剥夺剥削者，建立公有制，消灭剥削制度和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后来被列宁称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三是在社会主义阶段经过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和思想、政治、文化的巨大进步，最后进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对无产阶级解放的步骤和条件的全面分析。但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一个基本事实是资本主义严重剥削和残酷统治的存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迫切任务是用革命理论训练无产阶级队伍，为实现无产阶级的第一步解放做好准备，而实现第二步解放还不是直接的实践问题，至于实现最后解放更是遥远的理想目标。这样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在马、恩的著述中，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内容自然居于显著的位置，而在革命后如何发展生产力、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内容，则并非阐发的重点。这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把无产阶级解放的第一个步骤和条件分外突出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主要是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从而形成相对忽视发展生产力问题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也往往由此而来。

提出这三个论断，也是直接针对我们过去长时间中片面强调阶级斗争而不重视发展生产力致使社会主义建设一波三折的严重教训。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毛泽东同志……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①，“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②这就使人民生活未能不断改善，社会主义优越性难于发挥。“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 30 多年，截至 1978 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③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一直没有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各种名目的政治运动一再折腾着建设事业，使中国社会的发展坎坷曲折，迂回徘徊。正是鉴于历史教训和严酷现实，他反复强调要把发展生产力放在头等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6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41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11 页。



重要的地位,指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①。

由前述三个重要论断体现和表达的邓小平马克思主义观,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完全吻合,一脉相承的:

1. 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切社会生存的决定因素和一切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

首先,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经典作家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就得生产,生产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起来,才会有社会生产。社会生产的一定历史形态,就是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方式中的决定因素则是生产力。所以生产力是人类社会能够生存的根本前提或基础。其次,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不仅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而且是决定性因素。生产的变化和发展,通常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生产关系以及全部上层建筑的相应变化,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前进。恩格斯说过,“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产生了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力的必然结果。”^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变更和变革的那段经典式表述,集中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和精髓。列宁坚决捍卫唯物史观的这一基本原理,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受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制约的”^③;“生产力状况”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④;“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⑤。

2.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表现在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上

从理论逻辑上来说,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比资本主义制度先进和优越,在于它建立在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就是既继承资本主义已有的发达的生产力,又创造出比它更发达的生产力。我们党的十二大曾据此把“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列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之一。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25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38页。

^③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页。

^④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页。

^⑤ 《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9页。

邓小平对老祖宗的观点深加发挥，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不大大发展生产力，就只有贫穷的普遍化，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3.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后的首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上升为统治阶级以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即 1918 年说过，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1921 年他还说过：“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①1923 年他又指出：“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②这里所说的“文化”是广义的，但首先是指经济建设，也就是他在 1920 年曾说过的“经济方面的政治”。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工作重心转移的重大决策后，一再强调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最根本任务”、“首要任务”、“主要任务”、“第一个任务”、“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其精神与老祖宗的思想观点完全一致。

4. 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最根本途径和保证

社会主义要最终战胜资本主义，靠的是什么？说到底是靠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列宁说得好：“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创造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③这是彻底的唯物史观。邓小平早在 1978 年 9 月就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

^① 《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23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73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6 页。

生活的改善上。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①其后他又多次重申这一思想,强调:“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怎么比较?是比生产力的发展。”^②“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要靠发展生产力。”^③这是对列宁上述重要论断的继承和坚持。

5. 在社会主义阶段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物质基础

马克思说,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是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④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最根本物质前提,要在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创造出来。邓小平在一系列论述中反复说明这个道理,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什么是按需分配?没有生产力的极大发达,没有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怎么搞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

由此可见,邓小平始终是从发展生产力与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与社会主义的特征及其优越性,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紧密联系、息息相关的高度,来思考和阐发大力发展战略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这就是他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正确性和深刻性之所在。

但是一些同志对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一直颇有微词,质疑和诘难之声时有所闻,例如认为这是搞“唯生产力论”,是抛弃阶级斗争观点,是背离四项基本原则,是为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的实用主义,等等。这些怀疑和指责是站不住的。

所谓搞“唯生产力论”。“唯生产力论”是第二国际首领们鼓吹的庸俗生产力论,其要害是否认经济不发达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邓小平曾说过:“马列主义没有‘唯生产力论’这个词,这个词不科学。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是反对庸俗

^① 《邓小平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80页。

^② 《邓小平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28页。

^③ 《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7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306页。

的生产力论，我们采取了和十月革命不同的方式，农村包围城市。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一样。”^①邓小平关于生产力问题的全部论述，说到底都是围绕在中国这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搞社会主义而展开的，与所谓的“唯生产力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

所谓抛弃阶级斗争观点。首先，阶级斗争观点固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但不是唯一的和最高层次上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阶级斗争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无产阶级解放的一种必要手段。它认为在存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而在消除了阶级对抗的社会中，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则在于社会基本矛盾的不断解决。邓小平在阐述发展生产力时，总是与实行改革为发展生产力扫除障碍联系在一起，并且从更深层次上思考，指出通过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是最大的阶级斗争”^②。其次，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否则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并要求对实际上确实存在的阶级斗争不可小看，必须及时地、有区别地给以坚决处理，不然发展生产力就将失去安定团结、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和条件。这怎能说他只强调发展生产力而忽视阶级斗争，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

所谓背离四项基本原则。事实上正是邓小平最先郑重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后来又是他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得最多，反对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化思潮旗帜最鲜明，态度最坚决，直到 1992 年的南方讲话，还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警告“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原因就在于他认为离开四个坚持，实现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任务就得不到可靠的政治上的保障和保证，唯其如此，我们“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③。

所谓搞实用主义。邓小平强调发展生产力，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他认为共同富裕是最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重要表现，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他还说过：“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④他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

^① 《邓小平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22—223 页。

^② 《邓小平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40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38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72 页。

由五句话三个层次构成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尽管“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列于首位，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却是落脚点和归宿，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作为一种途径和手段，服从和服务于共同富裕这个终极目标的。显而易见，这与所谓“实用主义”毫不搭界。

总之，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不是标新立异，更不是离经叛道，而是正本清源，还马克思主义以本来的科学面目，把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片面认识矫正过来。

以科学马克思主义观为指导，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正确回答了“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也就为进而正确回答“什么叫社会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确立了理论前提，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构建。

1. 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规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还是以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为中心，是社会主义时期一个极其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核心和要害问题。八大路线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把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确定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后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基本路线之所以错误，就是因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实行工作重心转移，是党的政治路线的根本拨乱反正。全会以后形成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集中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一个中心反映了我国这个经济落后的东方大国发展生产力的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它是兴国之要，是党和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体现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经济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它是立国之本，是党和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则为发展生产力选择了最佳途径和赋予科学社会主义以鲜明的中国特色，它是强国之路，是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政治保证，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

2. 制定了全面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区分开来，在肯定基本制度是

好制度的同时,指出具体制度即各种体制存在很多弊端,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现阶段的突出表现。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出发,认为解决这种矛盾的根本出路是改革开放(开放也是改革),其目的就是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束缚生产力的旧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出了“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等重要论断和系统的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把他的以发展生产力为第一要义的马克思主义观发挥到极致,坚定了我们党制定并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决心和信心。正是在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的指导下,我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

3. 产生了独树一帜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改革开放找到了最根本的立论依据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邓小平重新全面分析基本国情,作出了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论断。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不发达首先和主要的是生产力不发达,由此制约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方方面面。这一论断的确立,为社会主义建设找到了最根本的立足点,使党制定改革开放的重大方针政策有了最重要的现实依据。早在 1980 年 4 月邓小平就指出,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总结新中国成立 30 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①1987 年十三大前夕又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②这些论述,都是以生产力的状况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为着眼点的。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生产力状况既是划分不同社会形态的一个重要标准,也是判断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依据。正如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可以表现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一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将来的社会主义发达阶段,是可以表现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而经济上成熟程度不同,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社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12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52 页。